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提出、形成和发展

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党面临着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作为一个已有八十多年历史、而且正在执政的政党，如何适应世界进步潮流，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真思考并回答的历史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摆在我们党的面前。时代呼唤着新的思想，实践孕育着新的理论。

1. 党的历史发展的新要求与“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

党的建设，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为实现这些任务而确立的理论和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9年10月，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任务和党的状况，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

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把我们党建设好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围绕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建设了一支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执政的党，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思考执政党的特点，从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就清醒地估计和分析了党执政后所面临的新形势，并就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向全党敲响警钟。毛泽东借鉴了苏联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像斯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必须从制度上进行防范。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容是非常丰厚的。他认为执政党要时刻保持先进性。早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清醒地估计和分析了党执政后所面临的新形势，并就如何加强党的先进性向全党敲响警钟，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38 - 1439 页。

1956年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①

毛泽东强调执政党要反对官僚主义。建国后，毛泽东以极大的决心领导全党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他指出：“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他还指出，贪污和浪费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同各方面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密切联系，因此要“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②在毛泽东领导下，三反运动取得伟大的胜利，这对于整肃党纪，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密切联系群众更是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建国以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向全党发出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指示。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党中央又发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克服党与群众关系方面的关门主义倾向，要公开建党。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讲话，强调党员和党的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③要放下架子，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8、209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02页。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保持党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毛泽东还指出，执政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基本确立。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党在此时也在探索自身建设的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经过一个多月听取各部委的调查研究汇报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个讲话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了新中国几年来的建设经验，提出了一些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

对执政党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做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2月，毛泽东根据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分析了各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这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对党内问题，毛泽东提出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1962年，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强调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执政党要反对主观主义，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要维护党的统一和提高共产党员标准。但很可惜，八大以后，毛泽东并没有沿着这一探索的思路走下去。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立，为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的重要功绩，更重要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全党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而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思想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曾经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党的建设的思想，其中也包含着党如何更好地起领导作用，这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以后，邓小平先后担任过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1943年11月，他在北方局党校整风会议上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他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

起来，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①

邓小平在 1941 年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第 35 期上发表的文章中，严厉批判了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影响，提出了党对根据地政权实行正确领导的途径和方法。他说：“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党内某些同志存在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他指出：“第一，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其结果怎样呢？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88、87 页。

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出，对政权实行正确领导的原则，应采取指导和监督的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① 鉴于此，邓小平还提出党对政权领导的方针和措施。

建国以后，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职务。1952年，他由地方调中央工作，先后担任政府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协助毛泽东处理党的日常事务，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期间，他为党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适应执政后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思想。

建国初期，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阴谋抢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1953年底，毛泽东为了加强中央集体领导，提出把中央工作分成一线、二线。高岗为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用封官许愿的办法，在党内拉拢扶植自己的势力。他们试图拉拢邓小平、陈云。邓小平、陈云以高度的党性觉悟和原则精神，明确表示拒绝，并立即向毛泽东反映。后来，邓小平在回忆揭露高饶问题的时候曾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12页。

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①高饶事件是建国后党内发生的第一次严重斗争，揭露高饶问题，防止了中央领导层的分裂。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决议》首先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决议》特别强调了高级干部团结的重要性，提出了党的高级干部必须遵守的六条基本规则和要求，这就是：（1）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党员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2）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3）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于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3页。

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4）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向所属的党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应直接向中央报告和反映；（5）全党高级干部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决议》还提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队的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决议》要求这些同志并经过这些同志教育全党干部要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决议》的这些规定和要求，有力地提高了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自觉性。

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是在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在全国执政七年来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教训，根据执政党的特点和党的任务，提出了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和原则。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

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① 因此，报告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结合执政党的特点和党内的状况，深刻论述了在执政党条件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极其重要性。报告全面地论述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针对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报告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决定党内的重大问题。报告强调了党的领袖对于党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但“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② 报告还对在执政党条件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加强党员队伍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都作了重要论述。上述内容说明，邓小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1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34、235 页。

在党的八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继刘少奇 1945 年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篇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之后，又一篇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文献。报告提出和阐明的关于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至今对加强党的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是邓小平在八大以后着重强调的对加强执政党建设有着深远意义的课题。1957 年，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他还说：“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

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①联系过去我们党在工作指导上的失误和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今天重温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更加清楚地看到党要接受监督的重要性、针对性和迫切性。

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邓小平关于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又一力作。1957年以后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发生的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一系列运动，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总结教训，调整政策，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做了报告。毛泽东、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都突出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对在执政党条件下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了深刻阐述。邓小平针对过去几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和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的教训，强调指出：“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加重了。”^②“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实行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真正的到群众中去。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0、271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3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同志们不要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问题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里也讲到，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① 这里把执政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提到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原则高度。对于党员和党的干部来说，能否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也关系到个人是否变质的问题。

1965 年 6 月和 12 月，邓小平在同一位外国党领导人的两次谈话中，系统地总结了历史上的建党经验，阐述了毛泽东怎样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他指出：“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 1945 年。我们从 1921 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年半的时间。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他指出：“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03 页。

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

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一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在桌面上来。毛泽东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①

还在 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就在十分困难

^①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44、346、347-348 页。

的条件下着手进行全面整顿，开始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种混乱和错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并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是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我们党的巩固和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鲜明地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开创了拨乱反正的先河。他在阐述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时候，特别论述了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批判“四人帮”反对毛泽东思想，给党的建设和党的作风带来的严重损害，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个时期，他突出强调和阐述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确立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逐步形成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为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在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思想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他又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

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他还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①为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他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②

在分析了党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之后，邓小平强调：“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328、329页。